·学术论文·

略论白彦虎历史评价问题

马 汝 珩

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建国以来，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人物作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近时期，在白彦虎历史评价问题上又出现了意见分歧，有的同志把白彦虎誉之为反清英雄，也有的同志把他贬之为“民族败类”，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双方意见，各执一端。为了进一步开展这一问题讨论，笔者就白彦虎评价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① 对历史人物评价也应该遵守这一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对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全面考察与具体分析。这就是说，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既要揭示出其一生活动中的主要方面及历史功绩，同时也要指出他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缺点和错误。然后铨衡功过，作出全面评价和实事求是的结论。对白彦虎的评价也应坚持上述的原则，任何偏执一端的看法，都是有背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如果要对白彦虎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那就必须对其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功绩与过错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指出他哪些活动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活动是应该谴责的，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及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那么，什么是白彦虎一生的主要方面和历史功绩呢？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他的抗清事迹。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有两点根据。第一，白彦虎所从事的反清斗争是正义的，是符合当时历史趋势的。如众所知，白彦虎是作为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族反清斗争的领袖而登上历史午台的，而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族反清斗争是西北回族人民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政策而发动的一场保卫民族生存的自卫运动。这场斗争，从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作用来看，应该说和当时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南各族人民起义一样，都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支持下腐朽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同时也延缓了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进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作为当时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斗争的正义性与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咸、同年间回族反清斗争的社会背景及性质问题，笔者已于另文中发表，② 这里不多作赘述。

当然，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与太平天国时期的各族人民起义不尽相同，比如由于这场斗争是保卫民族生存的民族起义，一些回族上层人物得以参加并领导起义，因而给起义带来某些

消极影响；再如由于回族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使起义过程中呈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起义目标，这些都显示出它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但是，我们不能仅看到上述的特点与复杂性，便对这次反清斗争的性质加以怀疑，甚至予以否定。事物现象总是复杂的，往往给人们以假象而掩盖住它的本质。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成为多余的了。"③要正确认识事物，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拨开假象，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我们在分析西北回族反清斗争性质时，固然要注意到它的复杂性的一面，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清政府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与回族人民维护民族生存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规定这一斗争本质的主要方面，它贯穿着整个斗争过程。因此，我们在探讨西北回族反清斗争性质时，首先应该看到这个主要方面。正如列宁所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④非常明显，前面所说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中呈现的复杂现象，并不是这次斗争"整条链子"的"主要环节"。也就是说，它不是规定这次斗争本质的矛盾主要方面，而是这次斗争的矛盾次要方面。尽管由于上述复杂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斗争进程。但从斗争整个过程来看，回族人民打击的总目标基本上是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第二，白彦虎作为西北回族反清斗争的领袖，他英勇果敢，态度坚定，一直与清朝政府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关于白彦虎英勇抗清的壮烈事迹，最近已有同志撰文作了介绍。⑤笔者不再重述。这里仅就白彦虎抗清的坚定性以及他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略作补充。

白彦虎和当时陕西回族反清领袖们一样，都是在回族人民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的高潮中涌现出来的领导者之一。他自从被推为十八大营之一的统帅以后，便积极投身于反清斗争的伟大事业。率领回族起义军转战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最后退至新疆，与清军对抗达十四年之久。然而，他在抗清态度上与某些中途动摇、变节投敌的回族领袖不同，而是顽强不屈，坚持不渝，一直与清军血战到底。就是在作战失利、处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面对着清军招抚政策的诱惑，他依然立场坚定，从未动摇。例如，在同治十二年（1873），当清军以剿抚并用手段，大力镇压西宁回族起义军时，退至西宁的陕西回军一些领袖们，便发生了动摇，如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在清政府的招抚下，所谓"倾心向化"，投降了清军。这些被招抚的回族义军被刘锦棠"挑其精壮，立为旌善五旗马队"，⑥后来这股叛降的回军成为清政府镇压回族起义的得力帮凶。但白彦虎在陕西回族纷纷降清的不利形势下，其抗清态度依然如故，始终如一地坚持抗清斗争的正确方向。据《征西纪略》记载："西宁陕回之就抚也，白彦虎独迁延观望。"⑦所谓"迁延观望"，实则是"拒不受抚"的同义语。这点，《平定关陇纪略》一书中透露得更为清楚，说陕西回军领袖崔伟等降清后，"惟白彦虎一起狡黠异常。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军所容，虽亦伪词乞抚，而责其呈缴马械，则迁延支展，观望不前。"这清楚地说明白彦虎在起义不利形势下，面对清军强大压力，虽"伪辞乞抚"，但拒不交出兵马器械，而以"迁延支展"的策略，争取时间，重整起义队伍，准备与清军再战，这也就是统治者说他"狡黠异常"之处。事实证明，刘锦棠命降清的回将冶福兴率军于小峡山一带进攻白彦虎时，白彦虎率义军奋起反抗，致使冶福兴"所部伤亡甚多，"而冶本人也被义军生擒后处死。白彦虎坚决抗清的英雄事迹，一直为后人所传颂。据调查材料说："回民元帅中最有血性的是白彦虎，他从金积堡奔至河州，马占鳌降，又走新

疆。出了嘉峪关后，有人见平沙无垠，想回来，同时官兵也从后边尾追而至，于是有人就劝白彦虎投降。白说：‘我头可断，这些广大妇孺老幼将如何’？”⑩表示出他为保卫回族人民生存而抗清到底的决心。

白彦虎不仅抗清态度坚决，而且给清军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据清方记载：白彦虎自青海退至嘉峪关外时，“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⑪但是，白彦虎所率的这支数千人队伍，作战勇敢，机动灵活，往往以流动的战术击败清军。与白彦虎作战多年的清方统帅左宗棠对白的战术看得十分清楚，他在给清政府的奏疏中说：“据实而论，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白逆自陕至甘，未尝占据城池。每迁劲军，未尝恋战。往往给诸目断后，自絜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划稍疏，则为所陷。”⑫左宗棠的这段奏疏，应该说是他与白彦虎多年作战的经验总结。所以左一再告诫其部下，在新疆地区与白彦虎作战时，要注意“贼之以弱示形，须防其羸师诱我。”⑬白彦虎在与清军作战中，的确成功地利用了这种避实就虚、以弱胜强的流动战术不断给清军以有力的打击。正因如此，清朝统治者对他恨之入骨，把白彦虎义军视为心腑巨患，一直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白彦虎退至新疆后，清朝统治者不断下达谕旨，责令左宗棠等要“查明逆首白彦虎等下落，毋任漏网，”⑭“应设法歼除，毋任滋蔓，”⑮“务将白逆就地捡斩，毋任远窜。”⑯统治者对白彦虎如此痛恨，正说明这支起义军的存在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统治的安全。

上述两点，应该说是构成白彦虎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也是对他进行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

（二）

对白彦虎评价的分歧，论者主要对他退到新疆后的活动及其最后逃往俄国的史实有所月旦。白彦虎是在西宁战斗失利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在玉门、安西、敦煌等地转战之后，才经过哈密、吐鲁番进入玛纳斯流域的。⑰在这期间，他率领陕西回族起义军与清军及汉族地方团练周旋、对抗，这正是他一贯坚持反清道路的体现，也是他在关内前一阶段抗清斗争的继续，本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⑱如众所知，自从同治四年（1865）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挟持着大和卓波罗尼都后裔入侵天山南路以后，新疆的政治局势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当阿古柏于南疆建立起伪政权并极力进侵北疆时，已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政治局面。当时摆在我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不论是当时爆发于新疆各地的反清起义势力，或是镇压起义的清朝政府与地方团练，都应暂时地捐弃前隙，携起手来共同抗拒浩罕入侵势力，恢复国土，这是民族大义的所在，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在这急速转换的历史关头和复杂离奇的政治局势面前，这位生活于百年前的回族穆斯林领袖白彦虎，并没有、也不可能认清当时的政治局势，他的一贯反清的立场与韧力，以及他对伊斯兰的虔诚信仰与浓厚情感，使他分不清内外与敌我，终于走上与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外国入侵者阿古柏联合反清的错误道路。这就是这位风云一时的回族反清英雄白彦虎的历史悲剧所在。

白彦虎与阿古柏合流的历史现象，看来似乎有些矛盾，一个誓死捍卫本民族生存而坚持

反清斗争的回族领袖，何以置中华民族大义于不顾，竟去与一个外国入侵者同流合污呢？其实这种矛盾现象表现在白彦虎身上并不奇怪，而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及其本人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首先，从当时历史条件来说。诚然，当时历史任务的要求，固然是新疆各支反清势力与清军联合共同抗击阿古柏入侵势力，而且在事实上如妥明、马明等反清领袖也转向与清军妥协合作，但历史事实证明，无论是新疆各支反清势力，或是清朝政府与汉族地方团练，能够洞悉当时历史形势的有识之士，寥寥无几。前已述及，回族反清领袖妥明、马明等曾向清朝政府竭力表示投诚共同抗敌的诚意，但得到的却是清政府的刁难与拒绝。⑲ 清政府拒绝义军投诚共同抗击外敌的作法，对当时已进入新疆境内并与妥明早有联系的白彦虎来说，对此不会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要设想白彦虎能与清军妥协而共同抗击阿古柏入侵势力，实难想象。因为在白彦虎与清政府之间已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敌对鸿沟。从清政府方面来说，即便是白彦虎能够认清形势，也转向清朝请求投诚，而一直把白彦虎视为心腑巨患并恨之入骨的清朝统治者也绝不会接受。再从白彦虎方面来看，要设想一个一直坚持反清斗争的血性汉子，能够向清军乞降投诚，更是痴人说梦，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在当时如此急转而复杂的历史关头，要使一个草莽出身的起义领袖，能够洞若观火般地认清形势，分清敌我，陡然改变其一贯的反清立场，扭转斗争方向，绕过这个历史的急转弯，诚比登天还难。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原宥白彦虎的过错，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其次，就白彦虎与阿古柏的联合来看，也有其历史原因。第一，白彦虎与阿古柏抗击的对象都是清朝政府，尽管两者抗清的目的与性质不同，前者是为了摆脱清政府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自卫斗争；后者则是外国入侵势力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但在当时白彦虎看来，他的抗清活动依然是保卫民族生存的正义事业，是他前一段抗清斗争的继续。从当时白彦虎的处境来看，他既要抗清到底，又为清军的追剿所不容，为了寻求生路和可供利用的力量，于是打着反清旗号而进行入侵的阿古柏势力，就成为他所寻求的联合力量。可见，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共同反清立场，是促成双方联合的触媒。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白彦虎与阿古柏的联合，虽有其共同反清的一面，但也有双方互相利用的一面。他们的联合关系，并非同心协力，真诚合作；而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据《戡定新疆记》记载："白彦虎自陕甘回窜，自知势力不敌，倚为声援。凡帕夏（阿古柏）所欲，不敢违也。故帕夏日富，而土回益贫。及闻大军来，白逆亦剃发易服，窃附于安集延，结死党与土回坚抗官军，自观成败，伺间脱逃。"⑳ 可见，白彦虎之联合阿古柏，不过是在清军追剿下，"自知势力不敌"，利用阿古柏势力"倚为声援"而已，一旦清军来攻，他就要"伺机逃脱"的。而阿古柏之联合白彦虎，更非真诚相助。据清方记述，于光绪三年（1877）三月，当达板城为清军收复，阿古柏军事失利时，阿古柏部下便"同声代帕夏乞款，愿缚送白彦虎，缴回南八城，以赎死"。而清军统帅刘锦棠则"听其致书招帕夏。"㉑ 可以看出，双方的联合都不过是利用对方力量，一到关健时刻，便抛开对方而只顾自己。尽管如此，然而白彦虎与阿古柏的联合，在客观上已配合了阿古柏入侵势力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这就铸成了他一生当中的重大历史错误。尽管他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这点，然而，无情的客观历史事实却给他的正义抗清事业推向了反面。

第二，白彦虎之所以能与阿古柏联合的另一条件，就是双方都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宗教信仰是促成他们互相接近的纽带。众所周知，浩罕是当时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之一，

阿古柏侵入南疆正是以新疆伊斯兰教贵族和卓家族后裔为号召的。据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向清廷的奏报说："乌城之贼，土回居多。白彦虎复絮陕甘捍回，分据红庙、古牧也、玛纳斯，与相联，而皆南与安酋帕夏通。自帕夏踞喀什噶尔各城，吐鲁蕃、阘展以西土回皆附之，帕夏能以诈力制其众。"㉒这里所说"帕夏能诈力制其众，"实际上就是阿古柏以伊斯兰教旗号为号召，对南疆各族穆斯林施以宗教影响的结果。人们还会记得，阿古柏之所以能够侵入南疆，也正是由柯尔克孜族伊斯兰教领袖思的克伯克去浩罕请援而招致的。伊斯兰教的信仰，对于百余年前出身于回族的白彦虎来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很难科学地分清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国内穆斯林与国外穆斯林的关系。在他看来，天下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穆斯林）是共通的，都是由一个教祖传播下来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就是回族，而回族也就是伊斯兰教，他保族也就是保教，因而在他一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抗清的思想支配下，势必要与以打着伊斯兰旗号的阿古柏相接近。白彦虎的这种"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思想模糊了他的视野，使他分辨不清内外与敌我，最终走上了与外国侵略者阿古柏同流合污的错误道路。白彦虎的"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也是有害的。百余年来，帝国主义者就是利用这种思想，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号召，在我国穆斯林地区策动民族分裂的侵略活动。白彦虎所犯的错误，对今天中国的穆斯林来说，不能不引为鉴戒。

关于白彦虎最后逃往俄国的问题，论者也多有指责，认为他逃居国外是对祖国的"背叛"，这种看法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论据，因而值得商榷。非常清楚，白彦虎作为清朝的叛逆者，从他一贯反清的政治立场来看，他既不可能被清朝政府所容留，更不可能自动降清引颈就戮，他兵败之后的唯一生路，只能率领残部就近逃往俄国政治避难，以维护这部幸存下来的回族人民的生存。为了抗清事业而逃居国外者并非始自白彦虎。早在清初顺治年间，我国著名学者朱之瑜（舜水），于东南沿海一带，曾先后参加南明将领和抗清领袖黄斌卿、张名振、郑成功等人领导的抗清活动。他于抗清失败后，孤身一人，漂流过海，逃往日本政治避难。此后他一直于日本从事讲学、传艺和著述活动，直至老死于日本。朱之瑜的学识与气节，深为中日两国人民所钦佩，但从未有人给他冠以"背叛祖国"的罪名。既然如此，那么何以对与朱之瑜相类似的白彦虎独加指责呢？这未免有失公允。

评价历史人物，既要看到他的功绩，也要指出他的错误。而历史人物所出现的过错，往往是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㉓既然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历史本身又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们的历史活动和认识，就不能不受所处的时代制约。上述白彦虎在与阿古柏合流问题上所出现的过错，固然有他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受客观历史条件与时代局限所致。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历史人物评价时曾说过："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㉔对百余年前白彦虎的评价，也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功绩与过错，才能使人们理解和信服。因此，我们对白彦虎的评价，既要看到他坚决抗清的功绩，也不能忽视他与阿古柏合流的错误。然而功过相较，还是功大于过的，所以直到百年之后，新疆回族人民中间还广泛传颂白彦虎的抗清业绩，以表示对这位反清回族英雄的崇敬与怀念。㉕

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卷，第425页。

②见拙文：《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的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一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④《列宁文选》第二版，第3卷，第72—73页。

⑤冯增烈：《应该给左宗棠、白彦虎以公允的评价》，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⑥曾毓瑜：《征西纪略》卷三，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三册，第40页。

⑦见《回民起义》三册，第40页。

⑧⑨见《回民起义》四册、第167页。

⑩马长寿、冯增烈等：《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西安市、长安”部分。

⑪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二，见《回民起义》四册，第347页。

⑫⑬⑰⑳㉑㉒《回民起义》四册，第347页、342页、357页、363页、351页。

⑭⑮⑯《清德宗实录》，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六十。

⑱《列宁选集》第2版，第713页。

⑲见《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三，卷二六八。详见马寿千：《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载《西北史地》1966年，第1期。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㉔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见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㉕苏北海整理：《歌唱英雄白彦虎》，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